

怕热不下车的领导该摊上大事儿

■王攀

5日中午12时许，河南济源市一辆车牌号为“豫UD001警”的司法警车撞人后，后排座位上两个“领导”怕热拒不下车救人，被数十名群众围堵。双方僵持半个小时后，两个“领导”被围观者“请”出警车，其中一人下车后夺路而逃。记者从热心读者手中获得一份现场视频，证实了众多目击者的说法。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交通事故进行调查。

出了交通事故，车上俩领导竟然因为怕热在肇事车上不下来，还有说有笑。为什么不下车？或许在领导心里，一是没必要下车，撞人是小事一桩，不需要亲自出马；二是无需下车，事儿有司机代为处理，用不着劳驾自己；三，当然

也是最关键的，天实在太热，怕中暑。

可为什么在现场围观群众隔窗交涉的情况下仍旧不下车呢？先说群众隔窗交涉，这说明群众已经不满领导不下车了。而在群众的隔窗交涉下，俩领导仍旧长时间不下车，这说明，他们的群众路线意识实在太差——群众认为领导不下车不妥，而且也已经表达出来了，作为领导仍旧没有跟群众站在一起，相反还跟群众唱对台戏，看来他们的确需要接受一下中央正开展的群众路线活动的“洗礼”了。这还说明，在长期的锻炼之下，两位领导不仅心肠硬，脸皮也相当厚——面对群众的不满和指责，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

事件被曝光后，面对网上舆情，他俩所在单位——济源市司法局，在发布的情况说明里，丝

毫不提领导不下车的事儿，反而大篇幅介绍司机如何报警、拨打120，如何施救，如何送医院，单位如何派专人陪护……这说明，领导所在单位根本没有觉得领导不下车有什么不妥、是什么大事儿，当然也可能是不好意思说。的确，这样的笑话加丑闻，实在不好意思张口。

老百姓眼睛里揉不进沙子，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这样的事。最好的做法是两个领导站出来好好地解释一番，真诚地道歉一番。不然的话，有图有真相，还怕对不上号？在互联网上被围观不是什么好事，尤其是当领导的。想想周久耕、杨达才就知道了会有什么后果。回避错误，用错误掩盖错误，只能造成更大的错误，最后一发不可收拾。这是教训，但这样的教训貌似还没有被有些人汲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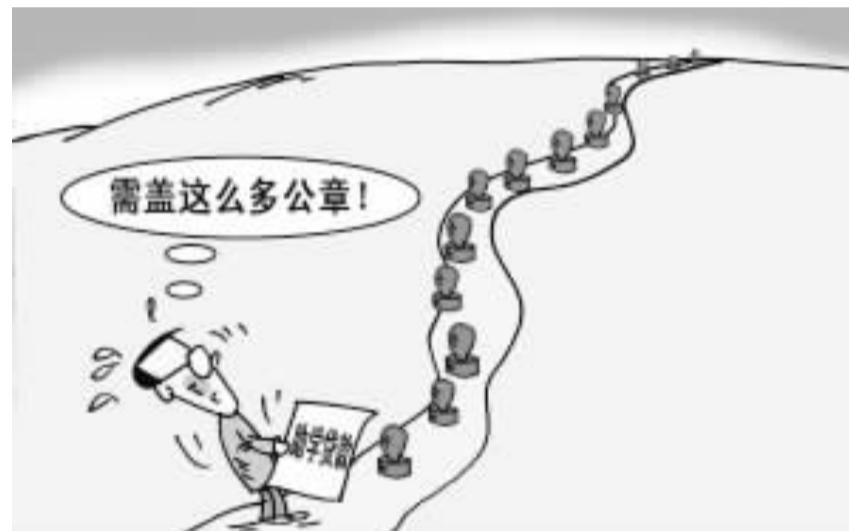
盖章之路

■文/涅水缨 图/唐春成

眼下是贫困大学生申请助学贷款的日子，湖北经济学院一名学生向记者反映，助学贷款需要证明、申请等各种材料共十几张，学校、院系、村委会、镇民政办、县民政局，要逐个跑到，一共盖了26个公章。大热天这样折腾，有部分同学办了一半就索性放弃：“有这个时间和精力，还不如去打工挣学费。”

为一份助学贷款，就需要盖26个公章，经历数十次折腾，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层层把关，程序严谨，而是标准的官僚主义和瞎折腾。

在县乡便民服务中心开设助学贷款平台，或者依托县民政、教育等相关职能部门设立助学贷款办公室，综合调度各种权力资源，以完成助学贷款的一条龙审批、一站式服务，这并不是什么复杂之事。助学贷款所涉及的26个公章，那么多权力部门压根儿没有想到“宁愿干部跑也不让群众跑”，自然不会送服务上门，不会放低身段俯就服务对象。因为手续过于繁琐冗长、跑了N多冤枉路也盖不全这么多公章，有的贫困大学生甚至宁愿打工挣学费也不愿再申请助学贷款



了——这种无奈放弃，违背了助学贷款的制度善意和初衷，亦是对某些部门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的无情嘲讽。

作为一项助贫困生圆大学梦的阳光工程，助学贷款重在救急和济贫，与其他商业贷款有很大区别，不应有太多太繁琐的手

续。26个公章、高温酷暑下的奔波折腾“难倒学生”，这种怪象也在提醒人们：为贫困生助学贷款开通“绿色通道”太有必要了，有关部门为贫困生排忧解难，其实也是在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四风”，更是在密切联系群众、竭诚服务群众。

“收监难、保外难”需顶层设计

■杨涛

法院遭遇病犯“送监难”，有的贪官患有“富贵病”在判决生效后被刑罚执行部门拒收；有的贩毒分子多病缠身，看守所拒绝收治，屡抓屡犯更加有恃无恐……近日，媒体对韶关和广州两地法院“送监难”问题调查发现，监所机关对病犯是否应当关押产生分歧，甚至有的犯人因看守所拒关押，在法院作出判决后逃之夭夭，让法官直叹“法律尊严很受伤”。

一方面，是患病的罪犯，由于法院与看守所、监狱等方面分歧导致收监难，让“法律很受伤”；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患有重病，特别是艾滋病的罪犯，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但由于家庭贫困，家属不愿意担保，导致罪犯无法保外就医，只能在监狱接受简单治疗，同样让“法律很受伤”。看来，国家对此问题应当统筹规范，进行顶层设计，确保法律的尊严。

但愿“灵魂讣告”引出喜剧结局

■雷钟哲

艺术家丰子恺的旧居3三年前被丰子恺后代以“民办公助”的形式免费向公众开放展览，这种恢复名人故居的新模式一度被传为佳话。然而，今年6月的某一天，丰子恺旧居展示的3册旧书失窃。为此，工作人员写了一篇“灵魂讣告”放在空白展台，希望以此来感动“一时犯昏者”。

半个多世纪前的珍本《画集》不翼而飞，这的确是一个尴尬的事情。想想，在一个不用掏钱的展览馆里，浏览凝聚艺术家和弘一法师创作心血的作品；而进入这类展馆的客人，不说他是饱学之士，至少也是读过几天孔孟书的。何以会以

第一个问题，跟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各个部门的解释、规定和文件相冲突有关。例如，《刑事诉讼法》对于患病未收押的罪犯，看守所、监狱拒收押的情形，并没有明确规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称“罪犯需要收押执行刑罚，而判决、裁定生效前未被羁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将罪犯送交看守所羁押”。但是，国务院《看守所条例》却规定，看守所收押人犯，应当进行健康检查，如果“患有其他严重疾病，在羁押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不予收押。这里面就存在一种矛盾，如果法院认为罪犯虽患病，但仍然符合收监条件且应当收监，而看守所认为患有重病而不符合收监条件，两者就会各执一词，相互只执行本部门制定的对自己有利的规定，最终导致患病罪犯无法及时收监，影响到法律尊严。

第二个问题则是，有关患病罪犯因为监狱医疗条件差确实需要保外就医，而家属因为经

济条件等原因，而不予担保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于这样的罪犯，我们国家并没有建立有效的医疗保障制度，让经济条件确实困难的罪犯，能获得医疗保障，从而让罪犯家属愿意担保他们保外就医，对于患艾滋病的罪犯来说，尤其如此。据统计，广东省艾滋病罪犯的保外就医成功率仅为3%。这对于监狱贯彻人道原则而言，并非有利。

两个问题，都不是一地法院、看守所、监狱甚至地方政府统筹能解决问题，都需要顶层设计。对于第一个问题，必须完善法律，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来解决法院与看守所、监狱的分歧，例如法律规定由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来确定罪犯能否适宜关押，以解决几家的争议。第二个问题，则是需要加大国家对监狱的拨款力度，建立相应的医院，以解决罪犯就医难的问题，同时，建立对罪犯的医保制度，保证那些经济条件差的罪犯保外就医后，能接受适当的医疗救助。

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洗心革面退还赃物。

《护生画集》被盗之后，杨朝婴（丰子恺外孙女、展馆工作人员）虽然痛心，但并没有报警，而是以“灵魂讣告”的形式，试图唤醒“一时犯昏”的人，让他物归原主。这就是一个宽容理性的做法，留下了转圜的余地。在我看来，“灵魂讣告”是对窃书行为的文明回应，较之撕破脸皮的诅咒，更具有洗涤灵魂的功效（没效除非是灵魂已死）。所以，奉劝这位窃者，在看了《护生画集》之后，能够顿悟宇宙的根本和人生的究竟，将《画集》完璧归赵。如此，才会成就一段失窃的传奇，才会得到喜剧的效果。一个灵魂，也会缘此净化；一段佳话，也会缘此流传了。

“伪基站横行”与通信巨头的庸懒

■知遇

据报载，今年以来，广东、湖南等地多次接到群众举报称，手机号码被人冒用发送诈骗短信，或者在银行、机场等区域手机经常没有信号并收到大量广告推销短信。经调查，这是一种利用“伪基站”设备作案的新型违法犯罪活动，一个“伪基站”可以将方圆500米范围内的手机强行控制，使手机与原运营商信号隔离，然后发出诈骗短信。“伪基站”设备还可以任意冒用手机或公用服务号码强行向用户手机发送短信，涉及地域广、社会危害非常大。

近年来，公民个人的信息通过手机和互联网泄露越来越严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一些部门和行业从业人员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非法提供给他以此获利。据说某些SP公司与运营商私下有协议，运营商向这些SP公司出卖端口，放任其向手机客户群发短信，每年运营商坐收短信费用的分成。短信覆盖什么人群，发送频率多少，要影响多少地区，都变得更容易精准操作。在长期给手机用户带来骚扰的同时，背后运营商从未见因此受处罚。即使群发的短信有明显违法和诈骗嫌疑，运营商也能以无法监控为由解脱。

如今，新出现的“伪基站”，一天可以发十几万条短信，相比要分钱给运营商的做法，一天就可以节省上万元。全套设备十几万的成本，使用10天就可以收回。更危险的是，这些基站可以冒充公用服务号码，甚至在银行附近操作，让公众被蒙骗上当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奇怪的是，号称实力一流的几大国内通信运营商，直接面对着这种游击队骚扰，眼巴巴看着自己的服务号码被冒用，未见可抗衡的办法。如果不是公安部对这种新型高科技犯罪做出严厉的打压态势，真不知运营商有没有紧迫感去搭理这些犯罪行为。

其实，对公民信息的保护，并不应该等待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扩大化后才动手的。尤其是电信监管部门。无论舆论对运营商怎样质疑，监管部门要么拿着国家法规做挡箭牌，要么就以不干预企业经营为由，任其垄断获益与服务质量长期不对等。比如公众对过滤垃圾信息、保护个人信息隐私、不受非法电信号码诈骗等方面都有强烈的诉求，然各大通信巨头基本都采取一种准官商的懒理态度。倒是民营的互联网企业开发出众多的“手机卫士”，给予手机用户一定的反制的能力。但对广大非智能手机用户尤其老人用户来说，垃圾短信还是能长驱直入的。

“伪基站”的出现，不但是高科技犯罪的法律问题，也是检验各大运营商能否与时俱进、真正维护客户利益的问题。如果任由基站泛滥而只将责任交给公安，这种庸懒的思维只会引发消费者更激烈的质疑。消费者遭遇通信骗局并非个案，这与通信企业的不合作、不积极、不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